

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

华北五省市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交流会文集

山西省金融学会
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九月

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

华北五省市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

交流会文集

山西省金融学会
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 说 明..... (1)
- 中国金融学会印发《华北五省、市、自治区
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交流会综合记录》的通知...(2)
- 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
交流会综合记录..... (1)
- 对金融史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孙及民 (11)
- 货币金融历史理论研究的探讨
——现状和展望——.....周世敏 (24)
- 怎样研究中国近代金融史.....盛慕杰 (40)
- 关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工作的
几个问题.....卫毓俊 (56)
- 对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的几点看法.....黄 炎 (68)
- 略论《大事记》的编写.....薛恩康 (75)
- 谈谈金融志的体例构思问题.....郝建贵 (83)
- 我是怎样做金融史志工作的.....师育谦 (88)
- 《山西金融志》编写随感.....张如祿 (93)
- 领导重视群策群力努力搞好金融史研究
工作.....山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 (98)
- 编写天津金融史志的作法和经验
.....王居庆 王绍华 沈大年 (103)
- 我们是怎样搜集内蒙古解放区金融史料的
.....李 敦 王 彤 (107)
- 《晋察冀边区银行》史料搜集点滴
.....贾章钰 (113)

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会 金融史研究交流会综合记录

(一)

山西省金融学会根据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会第三次联席会议的协议，经与各学会商定，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三十日，在塞外古城大同市召开了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第一次交流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会、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代表；部分大专院校从事金融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教授、专家；会议特别邀请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上海、山东金融学会的同志出席了会议；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山西省金融学会会长张毅，副会长王少浩和山西省人民银行副行长张绍瑞等同志参加了会议。正式参加会议的代表共三十余人。

中国金融学会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史研究会主任孙及民同志亲临会议指导，并就进一步如何开展中国金融史研究作了讲话。

大同市人民政府、雁北行署的领导同志、大同日报社、大同电视台以及地、市各银行对会议的召开，给予很大的支持。会议还收到四川、陕西、湖北等省金融学会和因公外出

未能到会的特邀代表周世敏、姜宏业、王静然、洪葭管等同志发来的贺电和贺信与部分论文。

山西省金融学会会长张毅同志致了开幕词。之后，五省、市、自治区交流了工作情况，畅谈了工作中的体会和认识。接着，由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卫毓俊同志以《关于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工作的几个问题》为题、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研究员盛慕杰同志以《怎样研究中国近代金融史》为题，分别做了专题发言。他们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一致好评。

这次会议，通过情况交流，检阅了研究队伍和学术成果，总结了经验，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并结合专题发言，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了不少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为今后开创金融史研究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圆满地达到了会议予期的目的。

(二)

会议的主要收获有四：

一、会议就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史研究工作做了全面的回顾。

大家一致认为，华北五省、市、自治区的金融史研究工作，虽然起步维艰，但是前景喜人，呈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会都相继组建了专门的研究班子；到目前为止约有研究人员近百人，（包括新组建的修志队伍）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较一年前有了明显的增加和提高。已经搜集的史料当以千万字计；已经出版的有《阎锡山和山西省银行》；即将出版的有《山西票号史料》；已经脱稿送审和

作为征求意见稿刊印发行的有《北京金融史料——当代北京金融大事记(1949~1984) 1~3分册》、《天津钱庄简史》(讨论稿)、《天津金城银行(1917~1937)史料》(第一册初稿)、《山西金融志》(上册初稿)、《太岳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料》金融分册和《晋察冀边区银行》(初稿)等;已经开始进行选档、阅卷即将整理编稿的有天津银行史料第二册《天津大陆银行史料》、《晋察冀金融史资料》、《东蒙银行、内蒙古银行、内蒙古人民银行史料汇编》、《东蒙银行、内蒙古银行、内蒙古人民银行大事记》、《西北农民银行史料》、《当代北京金融资料丛书》等。此外,通过报刊发表的史志研究文章近百篇。各省、市、自治区还积极参加了当地通志金融专卷的编纂工作,也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会议还特别指出,在从事金融史志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和编写成书的过程中,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们不怕艰难困苦,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曲折反复的精神,尤其难能可贵。

二、会议就上述成绩的取得,交流了经验和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金融史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

在交流中,大家都深有体会地介绍了省、市、自治区和总行、分行领导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北京市委书记亲自部署如何抓好《当代中国的北京》的编纂工作。内蒙古党委就如何编写好《当代中国的内蒙古》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中共天津市分行党组参与领导组建了《天津的银行史料》编委会和编委办公室,推动了工作的顺利发展。山西

省政府领导、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分行领导对《山西金融志》的编审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具体帮助和支持。中国金融学会和总行金融研究所多次亲临山西等省，面传经验，具体指导帮助，激励着同志们奋发努力，不断进取。

(二)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是金融史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

与会全体同志都特别指出，金融史研究工作要强调一个“用”字。要联系实际，借鉴历史经验，指导工作，为现实服务。要把金融研究的成果为今天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所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所用；为经济、金融的体制改革所用；为繁荣当代中国金融事业所用。大家感到，在这些方面是大有作为，大有用武之地的。

(三) 金融史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典范。

大家以亲身实践说明，历史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上曾经推动和阻碍过经济发展的金融活动，都应该一一予以认真的研究和总结。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其精神原则对建国以前的历史问题也是完全适用的。因此，也是衡量金融史研究工作成果如何的唯一标尺。

(四) 动员“千军万马”，多方搜集史志资料，广采博征、详勘细核、严审精选，是金融史研究工作的坚实基础。

大家感受最深的就是史志资料的匮乏奇缺，搜集资料的艰辛不易。因此，在资料的搜集中，不能只靠少数人旷日持

久地打消耗战，而要动员尽可能多的人，特别要集中一深时间广泛搜集、采访口碑资料和实物，查阅和清理档案、图书等文字资料，搞好“抢救”工作。内蒙的同志说的好，发现史料要穷追不舍，搜集史料要宁多勿少，考订史料要宁严勿宽，采用史料要宁缺勿滥，只有这样才能谈史志的研究工作。

(五) 走向社会，借助院校，聚集各方人才，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是金融史研究深入开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家列举了近年来金融史研究成果中相互合作的生动事例，说明金融史研究工作不能囿于银行界的小圈子，而要放开眼界，看到社会上有不少有志于此的学者、专家、特别是在大专院校多年从事金融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教授、专家，他们学有专长，又勤于著述，为金融史研究做了很好的工作。

(六) 实事求是，编修信史，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是金融史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

大家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是不唯风，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史而不真，何以为史？史而无信，何以为鉴？对历史事实不缩小不扩大，做出公正的评价，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是金融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七) 加强队伍的自身建设，注重史德史才，是金融史工作不断繁荣长青的关键。

史志研究工作具有长期性、延续性、专业性。因而研究队伍必须保持相对稳定，不断充实，增添和培养新生力量。同时，还要求研究人员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面壁甘读十年书”的矢志不渝的精神，有知难而进，不患得失，不

搞资料私有、资料封锁的史德史才，并把这种精神和道德风尚，言传身教给史志研究的后来者。

(八)最后，大家还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认识到从事金融史研究工作，要不怕曲折反复，大胆探索史志研究工作的规律，才能攀登史志研究工作的新高峰。

三、会议对金融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进行了重新认识。

会议认为，从全国来看，史志研究工作和史志编纂工作正方兴未艾，蓬勃发展。我们华北地区的金融史研究工作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应当看到各地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对金融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还存在许多实际问题没有获得妥善解决。

大家谈了如下看法：

首先，要把金融史研究工作摆到一个适当位置上。有没有一个适当位置，对金融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关系重大。道理自不待言。对于这一点，不论是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还是组织、领导金融史研究工作的同志，都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二、金融史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家认为其意义至少有三：一为存史，有惠后人；一为继承，有所借鉴；一为发展，有所作为。中国人民历来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金融工作者，更要保持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为祖国丰富的文化宝库增添新的财富。并必将对现实的金融管理体制改和开辟新的业务领域，提供借鉴，有所贡献。

第三、对金融史研究应有紧迫感和责任感。特别是从事近代、当代金融史研究，需要大量的真实的史料，眼前不少

当事人还健在，但他们多已年事甚高，精力减退。他们的记忆里保存有宝贵的史实材料，如不及时抢救，就会貽悔无穷。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蓬勃发展，一些重要的历史遗址遗迹，实物文存，如不及时搜集、考证，也将从大地上消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应有朝夕必争、寸纸必夺、日夜工作尤恐不及的精神，把历史赋予的责任承担在肩、开拓前进。

第四、金融史研究工作的队伍后继乏人，急待充实增添新生力量。为了搞好金融史研究工作，不仅要动员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老领导参加，以发挥他们的余热；同时，更要把培养史志研究工作的接班人当做大事来抓。因此，金融史科研工作，要尽快在高等院校增设史志课程，直接培养金融史研究人才。

第五、金融史研究工作在加强横向联系的同时，必须争取纵向的领导和支持。对于中国金融学会、总行金融研究所以及当地党政领导，都应取得直接的、紧密的联系，并争取他们在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支持，以不断改善研究人员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作质量，加快工作进度，以便早出人才、早出成果、早出经验。

四、会议还围绕目前研究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有益的探讨。主要是：

(一) 主线问题。即研究中国金融史的着眼点问题。综合起来有三点：首先，要着眼于经济。要抓住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这个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把问题摆到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其二，研究近代金融史，必须牢牢抓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对金融动向的反作用，从而对近代金融史做出正确评价。其三，要着眼于重大

历史事件，以把握时代的脉搏。

(二) 方法问题。大家谈到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 是以论带史，还是以史立论？因为我们是马列主义的唯物论者，“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结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所以，要坚持以史立论。(2)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是要牢记分析评价历史事物时，要以该事物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其结论必然也有所不同。再是要考虑到谁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分清主宾位置。三是不能割裂历史，如写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的，一定要注意它既是革命的根据地，有先进的生产关系的一面，同时它又是处在全国尚未解放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因此，不能割裂和超越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认识革命根据地里发生的某些特殊的金融活动。(3) 要处理好概念与材料的关系。理论是研究工作的指南，不是套话和标签。在金融史的研究中，往往遇到实际材料与理论不尽相符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大家认为，要从史料本身去探求结论，绝不能拿材料去套所谓理论的框框。

(4) 要采用科学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即唯物辩证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主观片面性；对过去一些学者及其著作，要看到他们时代的局限性，了解情况的片面性，不能全盘否定，而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 体例问题。一是史与志的体例问题。大家同意这种看法：即在长期的编史修志过程中，史与志已形成一定体例。一般来说，史与志即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联系是指史与志都是反映和记载历史上的金融事迹的，这是他们的共性

之处。区别在于：1.志完全是选择的客观记述，寓褒贬于史实之中，史则无论何时都增加了表述人的观点、思想和评品在内；2.志的个性大，史则共性与个性兼而有之；3.旧志受中国传统思想“重本轻末”的影响，多不志金融活动，给今天修金融志者以很大困难。史则对金融史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刻画。至于在实践中，是严格区别史就是史，志就是志，绝对不能含混呢？还是从占有的史志资料出发，选择适当的能够正确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形式，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搞“百花齐放”，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应该考虑到总体工程的要求，不能在总体工程之外去搞“百花齐放”。二是史与料的问题。料应该是第一性的，是实的东西；史是料的概括，是从料中抽象出来的，是第二性的。是搞史还是搞料，也应从占有的材料出发，能够搞史则搞史，史不足则搞料。一般讲，可先搞金融资料或史料丛书，逐步积累再成史。三是共性与个性问题。应当强调突出个性。突出个性，即突出主要矛盾。要正确反映历史上某一金融活动的规律性，就要突出其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不能搞千篇一律、模式雷同。

此外，还就大事记的编写、篇目的设置安排、题目与内容的关系以及材料的取舍和使用等，都做了有益的探讨。

(三)

大家一致认为，金融史研究交流会是一个好的形式，是华北地区金融史研究工作横向发展的一个创举，是银行系统加强横向联系的重要方面，是金融史研究工作互通情况、提供信息、交换资料、互相支持、积极配合、提高成效所必须采取的一条行之有效的措施。因此，应很好地坚持下去。

大家一致同意，今后在一定时间内，经过联席会议协商

选择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再次召开金融史研究交流会。

金融史研究工作，正方兴未艾，任重而道远。会议期望在下次会议召开之前，各地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和任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制定长远规划和近期安排，努力工作，扩大成果，使金融史研究工作更加朝气蓬勃，兴旺发达，为振兴当代的中国金融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华北五省、市、自治区金融学会
中国金融史研究交流会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日于山西省大同市



对金融史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史研究会

主任孙及民同志

我向大家请教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为了建设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金融史研究工作要结合当前的形势，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坚持下去，发挥作用，做出贡献。

我对金融史研究工作的看法是：前景喜人，起步维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去年五月，我在太原华北五省金融学会上讲过，这不是一个热门，但是也必须有人来从事这个工作。历史长河是永久的，人总是暂时的，自古人生谁无死。以今视昔，现在看过去是历史，后之视今，后人看我们同样也是历史，再过几年、几十年来看我们建国以来的三十七年、半个世纪以来的成败得失，还不是历史吗？所以，历史这门学问是最宏观的，那一门学科里没有历史的实践在里边呢。你搞自然科学的就没有历史了？你讲电子就没有历史了？都有它的历史嘛！社会科学更有历史了，哲学没有历史？从唯心到唯物，从机械到辩证都是历史。讲财政，财政也有历史。当代中国的财政能割断历史的影响吗，你能够割断根据地财政的实践吗？银行也是这样。历史这门学问是宏观的。各行各业都有个历史，有金融就有金融史。

当前，就银行来说是百事待举。改革形势要求它必须及

时来一个大变革。金融史研究要求行长们认真抓我们银行离休的老同志，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主动地发挥作用，以我来说我睡不着觉。当然，有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倚轻倚重，不能强加于人。现在抓抗日战争时期的金融史，不管史料也好，观点也好不宜迟了，但还有可为。因为这六、七十岁的还没死。再过十年、八年、三年、五年就连我们也不在了。今天想起曹菊如老行长，我还有遗憾。一九七四年秋，曹老对我们讲了七次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历史，就是没有接着讲下去，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银行史。我们当时是急于到苏区去调查。一九七四年冬我们先到延安、陕甘宁转了一圈，转过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到赣南老苏区，八月回来以后，当时形势已不允许再找曹老讲下去，到现在想起来已经是遗憾终身了。所以，我们从七四年搞历史的老同志，在实践中懂得了一个词叫“抢救”。现在看来“抢救”的紧迫感更加逼人。当年曹老就对我们讲：我是活的文物，你们要问什么事就赶快问，要不就成了古文物了。这是七四年讲的，没有几年曹老就不在了。所以，我呼吁：金融史研究做为一个事业来讲，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当然，在我们离休老同志的有生之年，就能够做出一翻轰轰烈烈的、蓬蓬勃勃的局面，我也不敢这么说，也不应这么想。因为这个事业确实是一个从无到有，由低到高，反复曲折长期的过程。说反复，就是我们做的、写的、编的、印的、讲的，有一个不断反复、修改、补充提高的过程。说长期，因为历史在不断地发展，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一定时候的认识在后来也会有深化。比如说，七五年我们到井冈山转了一圈，那是用了一百零八天，跑了二十五个点，历程三千公里，调查中华苏维埃时期的金融史料，后来由周世敏同志执笔，与财政

部共同编写的。当年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带着红四军上井冈山，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政治部主任是陈毅同志。但是，在编写这个史料时恰恰是不谈陈毅，不谈政治部主任，七六年初稿就是这么写的。以后再版了才修正提出来。革命博物馆保存的井冈山时的布告不象现在这样大，油印十六开的毛边纸，我们看到时，不知是谁把政治部主任下面的名字抠掉，政治部主任下面是两个窟窿！你说我们搞历史的需不需要做好长期的反复的思想准备，我说是需要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四人帮”还没有垮台前，革命博物馆有一次展出文革以来的出土文物，其中一部分是革命文物。有一个东西把我吸引住了，就是闽西银行印钞票的那个版。我就问他们怎么发现的，解说员讲不清楚。正在这时，恰逢曹老也去了。我说：“曹老，赶快来，我这可是重大发现呢，闽西银行当年你就在那儿”。我把曹老领到那个玻璃柜子跟前，曹老看了半天，又想了想说：“老孙，不对，不对，这东西倒是真的，可我们没有用过。”这不是一言千金吗！我问怎么办呢？曹老说：“这话可长了。当年，想印刷闽西工农银行的票子，派了一个同志到上海去，通过地下党做的这个版，但后来长期失去联系，最后听说这个人被捕了，下落不明。又过了一段时期，这个版通过地下党拿回来了。那时闽西工农银行的行长是李六如同志，后来经党委研究不能用，第一，这个版长期在上海，地下党给找回来的，究竟当时的国民党发现了没有，那个联系的人是死了、是叛了，不清楚，是不是国民党有意送回来的呢。所以，没有用”。我们根据地的银行是根据战争的需要建立的银行和发行钞票的。这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不象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产生的银行。我们根据地是个半自给的农村环

境，自然经济，而且附属于国民党的城市经济的。我们银行一成立，甚至没有成立以前就印票子。为什么呢？因为斗争需要就是对敌斗争。我们要驱逐法币出根据地，要用我们的货币反敌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有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经济上也有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我们发票子是从支援战争，建设根据地出发的，不单纯是根据地内部经济，自然经济的需要。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到井冈山发现了一枚“工”字的大洋。这个大洋是袁头，就是袁世凯袁大头。我们当时不能造，造出来的质量也不如它。所以，就利用它在上面不知用什么东西硬砸出一个“工”字来。就叫“工洋”。凡是在井冈山管辖的地区允许流通，不带“工”字的不许流通，要没收的。象这事都带有火药味。我们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会莫明其妙。这些活材料，只有通过向当年老人了解，否则，就没法理解，也没法知道。所以，我说金融史研究工作有个反复过程，长期过程，至于金融史研究工作的道路，总的趋势是发展的，具体经历是崎岖的起伏的。

金融学会从79年恢复活动五年多了，金融史研究也十一年了，我可以举不少例子。实践告诉我们今后的发展前途依然是崎岖的起伏的。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这里有很多因素，外因、内因错综复杂地起作用。但是，我相信金融史研究是长命百岁的。

以结合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银行体制改革，更不能对金融史研究置之不理。金融史这门学问、这门学科，这门事业，不是那一个人能让他兴就兴、让他衰就衰，历史上还没有这回事。历史兴衰都是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的活动。金融史研究工作是银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但这个思想要求普遍周知为时还早。当前，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拿这次会来